

万分之一的幸存者文彻赫恩

郑 义

这本自传名为《苦难的历程》，与阿·托尔斯泰(Aleksei N. Tolstoi 1883-1945)描写十月革命的长篇小说同名。小托尔斯泰曾流亡西欧，但没过几年便耐不住寂寞，终于回苏俄当御用作家去了。他的这部十月革命三部曲我看是写得有点违心。共产党允许你回去，给你别墅庄园汽车，你是不是总得有所表示？按照时间顺序，写完革命就该写劳改了。小托尔斯泰写完三部曲就去世了，没有写劳改，另一位世界闻名的大作家高尔基写了。虽然他被誉为呼唤革命的海燕，但还是被共产党的血腥所震慑。出走了，也是耐不住寂寞，又回去了。这就要将功补过，要极为无耻地吹捧暴君，还要去访问劳改营，讴歌劳改犯开挖大运河的伟大社会主义劳动。我们手上的这本书也写劳改，文字当然比不上那些大作家，但没有颠倒黑白，至少写得很真实、真诚。

文彻赫恩是一位中国劳改制度的幸存者。从中国的劳改营里活出来，这很不容易，从青海劳改营里活出来就更不容易。我游历青海时，友人曾告我“八百右派”的故事。说有广东右派八百余人送青海苦役，多年后“改正”时，发现竟无一人存活。广东方面抱怨说“也不能一个也没活下来呀？”青海方面则反唇相讥：“谁让你们往这儿送？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小托尔斯泰为《苦难的历程》(*Trudnye Gody*, 1943)第二部所撰写的开卷语是：“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

次，我们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按照这种说法，那化为白骨的八百个右派应该还是比较纯净了。

助人“纯净”的办法很多，最为简易且效率最高的是饥饿。现在甘肃省的“夹边沟”劳改营很有名，在大饥荒的 1960 年前后饿死了一千三百人，算下来有一半以上。文彻赫恩的见闻更可怕。他所在的劳改犯文艺队到“白浪沟”分场去演出，犯人们听说场长也来了，大呼“场长来喽！场长来喽！”随即一拥而上，把场长和干部们围得水泄不通。“几乎一个不拉的，二千余劳改犯非常统一，整齐的，一下子全都跪在场长面前，齐声大喊：

‘救命啊！场长救命啊！’拖拉机上的人每个都流下了热泪，我强忍着眼泪算未掉下来，但泪水已湿透了我的眼睛。饥饿使人变成无理性，好像人们都疯了。成千的劳改犯跪着不起来，最后刘场长宣布，从今天开始保证大家顿顿吃饱饭，这时大家才慢慢地起来，排队去领饭了。这个分场原有二千多人，到 1962 年这个分场撤销时，回到场部的劳改犯总数不到二百人，死掉 85%。”如果文彻赫恩的记忆无错，那白浪沟就远远超过夹边沟了。这剩下的 15%，还会以种种方式死掉一批，最后活下来，精神也没有彻底垮掉的，就实在是凤毛麟角了。还能写书，为那段苦难历史作证，也只有数万分之一吧？这样说起来，文彻赫恩的这本书确实是值得每一个同情心尚存的中国人祝贺的。

文彻赫恩出生于一个满族贵族家庭，青年时代曾参加学生运动，投身共产革命。中共夺权之后，他退出中共“解放军”，成为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高材生。不久他便因言获罪，沦为“阶级敌人”。据他自己计算，从 1958 年春被捕入狱至 1978 年冬平反

止，文彻赫恩共计坐牢二十年九个月零十一天，加上坐牢之前“群众专政”近三年，合计二十三年八个月。他如此概述道“我今天能活着出来，离开人间地狱，算是命大。虽然我没有死，可我精神上肉体上的伤痛将折磨我一生。我的鼻子被打断、左耳被打聋、牙齿因营养不良脱落十二颗，打掉四颗，共十六颗、腰被打致残，成终身疾病，这都是无法弥补的。特别是在精神心灵上的折磨摧残，使我的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将永生陪伴着我……我热爱中国，但共产党的独裁和暴戾迫使我逃出”古拉格”，远离中国，我只能生活在异国他乡，从遥远的地方怀念它。”

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毁掉了。最后的安慰奖是参加好莱坞影片《喜福会》的演出。他是纽约地区一千多名应征者中唯一被录取的，可惜是个小角色，不过几个镜头。聊以自慰的是“中国大陆有几个演员能在好莱坞上戏？”但事实是“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二十年以上的劳改生涯，还说什么呢？整个生命无非是“劳改期间”（主体）、“劳改之前”（初涉人世）和“劳改之后”（余生）三个阶段罢了。人的一生就这样毁掉了。

文彻赫恩是一个有良知的头脑清醒的人，但他仍然堕入受难者之间残忍的倾轧与互虐。在囚吏们的煽动下，难友们极其凶残地打他，九死一生。反过来，他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报复。在一次“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到来之际，他十分清醒地舍弃人性，“准备好一根白腊杆，四十公分长的木棍，这种木头不会断还有弹性。凡是斗过我的揍过我的人，都一一回敬他们一顿白腊杆，打得他们皮破肉裂，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哇哇叫！几个月下来我报复了不少人，心里才平静些、心理也平衡些，总不能老叫别人

揍啊！也得揍揍别人，尝尝那种滋味。”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在那种环境里有人性的人，慢慢也会变成没有人性了。热血变冷，人变成兽，既残暴又凶狠，甚至连禽兽都不如！”这大约正是劳改制度最成功的一面，就是利用人的求生本能和人性的弱点，迫使受难者互虐，从而建立起劳改营中的多数暴政！连文彻赫恩这样明白的人，都压不住仇恨，拎着一根白蜡杆把难友们往死打。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是耶稣基督。在那种制度下，我们无可避免地堕落为助纣为虐的魔鬼。我说“魔鬼”而不说“野兽”，那是因为野兽一般不会如此凶残地对待同类。这就叫“异化”，即，我们的努力反过来成为迫害与蹂躏自己的异己的力量。

除此，更加令人叹惋的是，文彻赫恩身为那个血腥制度的受害者，同时也是那个制度的宣传者、粉饰者。他导演了鼓动阶级斗争的经典之作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以及美化中共夺权史的歌剧《白毛女》、《江姐》、《红珊瑚》、《洪湖赤卫队》。特别是歌剧《洪湖赤卫队》，这是他在青海劳改营中的得意之作。当然，这不是他一个。所有的犯人不是也和看管蹂躏他们的“管教人员”一起鼓掌叫好吗？这也是共产专制最为成功的一面。任何野兽，都不会和猎人一起高唱狩猎之歌。这是一种极为奇特的人类现象。洗脑洗透了骨髓。我没有进过劳改营，没有资格来评论那些历尽酷刑、饥饿与死亡的幸存者。特别是本书作者文彻赫恩，他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真的死人堆，不是文学比喻。我尊敬他，我尊重他所承受的一切苦难。他、以及他的成批死亡的难友的名字，应当以金字写上我们这个民族的史册。血真是流

得太多了！当正义的暴风雨彻底涤荡那块大陆之前，是他们的脖子硬把刽子手的屠刀磨钝了！

我不是苛责文彻赫恩。我只是为我们这个被催眠被洗脑被打断脊骨的民族倍感痛心。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就共产专政这个制度而言，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建设者、维护者。不在其中者甚少甚少，自然包括我自己在内。

2003年9月1日 于华盛顿

参加 1947 年的学生运动

1947 年 5 月 20 日，学生运动从北大开始不久，就蔓延成全国性的运动，简称为“五二〇”学生运动。其时我们中学生可以不参加，但我们学校和别的中学不同，我们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是日本侵占东北之后，大批爱国青年流亡到关内北平，于 1934 年 3 月 26 日在北平成立的。抗日战争时期，该校迁往大后方四川省自流井市静宁寺。胜利后，1946 年迁回沈阳。这个学校自成立时起，学生就以校为家。学生都很纯朴，学习都很好，而老师们也同样以校为家，多是优秀教师。学生质量和教师质量在当时都是一流的，有许多教师都是留学生回国任教的，学生学习毕业后都能考上各名牌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其他的国立中学都取消了，只有我们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是唯一留下来的一所国立中学。

回沈阳之后，光学生就有两千余人，加上教职员工足有三千人。五二〇学生运动爆发的起因，是为北大一年级女同学沈崇被美军驻北平的士兵强奸而引起的全国性学生运动。我们学校特殊，所以也决定响应全国学联号召，参加全国学联决定的五月二十日罢课游行。本来决定在那天，沈阳市五大国立院校一齐出动上街游行，但学校早晨即被军警包围，学生无法走出校门，学联适时决定全体学生在校内罢课一天以表抗议。

没过几天，学校接到全国学联和东北学联的通知，全国学生在六月二日举行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为主题的示威游行。六月二日那天，原计划东北大学从北陵出发到马路湾和沈阳医科大学和我们学校汇合，从太原街游行到市政府。但天还没有

亮，军警已经把学校封锁得水泄不通，别的学校也如此。东北学联决定，全体同学在校罢课，绝食以表抗议。

我当时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因长得人高马大，所以学生会指定我为纠察员，保护学校及同学。当时，我守在靠北一马路的边门，和四、五个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聊天，看着包围我们的士兵端着枪来回的转悠。将近中午的时候，学生会决定派一名小同学溜出去给对面的沈阳医大送个信，告诉我们学校已开过全体同学大会，一致通过罢课绝食抗争到底，全体同学当场宣誓。可这位小同学走出去不到二十米就被抓住了。我们四、五个同学一拥而上把士兵按倒，并把步枪缴了下来。这个士兵看我们人多，站起来看看，撒腿就跑。不到三分钟，一辆吉普车开过来，一个尉官和三个手持冲锋枪士兵下车后直奔学校二楼办公室，学校教官出来，叫我们把枪还给他们。临走时，那个军官对我说：“警告你，下次再抢枪，可以当场击毙你，注意啦！”从此以后我倒是在全校出名了。

其实我们生活挺好，从来没有挨过饿。那为什么要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呢？当时，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年轻人爱凑热闹，觉得挺有意思的。由于我们游行被阻，我对当局的做法反感，认为国民政府不给学生自由，压制民主，所以对政府的专制不满，这是我第一次在思想上起了朦胧的变化！

当年九月开学不久，某天晚上自习后，我和韩良、韩宗泽、魏岱几个人肚子饿了，到校门口小馆吃水饺去。忽然看到从太原街回来的几个女同学哭哭啼啼地，我就上前去问：“出什么事了？”她们说：“去建国西堂看电影，被收票的人（是军人）摸

脸和摸屁股，所以电影没看就回来了。”我一听就火了，敢吃我们中山女同学的豆腐！我们知道建国西堂是军人电影院，属东北行辕管辖的。我和韩良说了一声：“走！我们找他们评理去，愿意跟我们走的来吧！”大概有十来个人跟了上来。

我们直奔建国西堂电影院，不到十分钟就到了。我告诉韩良：“你们在下面等着，我上二楼找他们经理评理去。”到了经理室，经理叫两个士兵把我看住了，竟然想把我扣下来。我拉开门大喊：“韩良快回学校喊人来，他们把我扣下了！”韩宗泽说：“我去。”我说：“回校后掀警铃。”不到十分钟，中山同学一千人左右把建国西堂包围，要求立刻放人，否则开砸。经理一看这些“丘九”也是不好惹的，就把我放了出来。我下楼之后大喊一声：“开始砸！”只见韩良拿着铁棍一下子就把门口的大镜子给砸得粉碎。这个镜子足有一丈高、二丈多宽，特大！这一来把电影院的观众都吓得往外跑。我们的同学往电影院里头冲，开始砸电影院了。大银幕被撕坏，音响座椅不到几分钟全部给解决了。

学生们准备回校时，整个大街上都是我们的同学。附近有一个有名的“咖啡厅”，一个穿著军官制服的上尉从咖啡厅走来说：“你们这些学生在胡闹甚么！”学生一听，火冒三丈，一拥而上。军官一看不妙，转身就跑，直奔中苏友好大厦，边跑边往天空放枪。同学们紧追不舍，他又往地下开枪。这一下不要紧，当场打在我班同学李善金的脚上。李善金大叫：“我受伤了！”魏岱急了：“你敢开枪打我们！”一个箭步冲过去，拿着铁棒子朝头上就是一下，当场脑袋瓜头破血流，学生们上前把他逮住，缴下他的手枪。魏岱把手枪交给我说：“怎么办？”我答：“先

把他押回学校再说。”我通知两个同学扶着李善金到附近诊所和医院包扎治疗，然后对全体同学说：“同学们快撤回学校去，军队说不定马上就赶来了。”同学们撤得很快。我们走不远就看到来了几辆十轮军用大卡车，上面站着全副武装的军人，直开到建国西堂。

学校同学们都集中在大礼堂里，已把开枪伤我同学的上尉军官五花大绑吊在舞台上的天桥下面。这时我的朋友郑安腾过来和我说：“这个受伤的军人是我们家的副官。”我一听楞住了。

“你们家的副官？他开枪打伤了我们的同学李善金，同学们火了才把他打成这个样子。”郑安腾是东北剿匪副司令郑洞国的儿子，我们是要好的同学。我当机立断，把人放下来，把手枪也交还给他。他满头血淋淋地和郑安腾走了。临走的时候还敬我一个军礼，并讲：“下次有空到家里玩。”后来我确实去郑家玩了两次，和这个上尉军官混得还挺熟。其实那个副官人并不坏，是误会了。

军队的十辆大卡车满载军人，已开到我们学校门口来了。当官的少校已上二楼校办公室去了，要求学校交出肇事者，带大盖帽的学生！魏岱跑来告诉我：“怎么办，找你呢！”我说：“得赶快溜呀！”魏岱跑回宿舍，拿来替换衣服。我到厕所换好衣服，从学校正门大摇大摆地走出校门，也看到军车上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看着我，我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过他们面前，回家避难去了。

回家的第二天，我看到《沈阳日报》和《沈阳晚报》都报导了这一消息，并指出有共匪学生在煽动闹事！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本人只是平生一贯爱打抱不平，有正义感，爱管闲事而已。

二个星期后，魏岱跑到家里来告诉我学校已出布告，我和韩良、韩宗泽三人是留校察看处分，我只记一个大过。至此，建国西堂事件总算结束。

1948年1月放寒假前学校宣布，沈阳市国立院校宣布学生一律要参加冬令营，不参加冬令营的一律开除学籍。我们入冬令营不到两周，元宵节前夕，本来和家里说好正月十五回家过节。晚上十一点钟我们遭到大逮捕，总共有百余入。有东北大学和沈阳医大的，我们中山的共有二十三人，东北大学最多，农学院也不少，沈阳医大有十三人。我们被关押在沈阳北市场一个军队的仓库里，是钢骨水泥的结构，都是水门汀地。东北本来就冷，这下可是雪上加霜了，又无暖气，感到特别冷。我们大家挤在一起取暖，女同学在楼下，男生在楼上，东北大学的学生发起绝食以表抗议。中山的同学是中学生，一般年纪都小，都听大学生的话，也参加了绝食斗争。

三天后，沈阳市警备司令王铁汉来探望我们。东大同学表示要求转换环境和改善生活。两天后，我们就迁到沈阳市第三女子中学宿舍大楼里了，全部睡在三楼，饭厅也是用三女中的。因为是寒假期间，学校没有学生。我们入冬令营时每人发的军棉衣，现在都贴上一符号在自己的左胸兜上面，写着“青训大队第四中队”，中间四个字是“爱国青年”，下面是自己的名字。

每天除了早晨上早操跑步外，其余时间都无事可干，打扑克的、瞎聊胡扯的都有，只许在三楼活动。宪兵虽然看守很严，但态度很好。这些宪兵都有高中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都是宪兵学校毕业的。他们是在日本执行任务回来后，接到看押我们的任务的，日子长了反而和我们交上朋友了。只要我们给他们钱，请他

们帮忙买一些日用品和吃的都可以。从他们的眼光里，我们看到友善和同情，这就是学生和学生的内在联系，不同于那些大老粗士兵。

我们听过一次报告，由长春警备司令廖耀湘主讲，内容大意是我们年轻幼稚不成熟，不要受共匪的欺骗，他们利用你们煽动罢课闹事，你们学生的任务就是在学校好好读书，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我受过两次审问，第一次问我：“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什么人介绍的？”我回答说我才上高二第一学期，不懂什么是共产党。何况我根本不问政治，你们可以调查。讲良心话，我还真不懂共产党是什么一回事，只知道他们挑起内战，想夺国民党的权！其时，我们班上的共产党员盖大北、孙辑六和刘大文在我们被捕的前一天已转移到开原县老区去了，而我们被捕的人大多数是在学校爱出风头爱管闲事的人，而他们共产党人从来不抛头露面，他们总是在下面搞串连，煽风点火。

第二次审问是在半个月后，问：“在去年六月二日罢课期间，你强夺士兵们的武器，是谁指使干的？九月份你带领学生把军人电影院建国西堂给砸了，是谁指使你干的？”我回答：“确实没有人指使我，所作所为完全出于正义感，自动自发，都是临时动议，无任何预谋和计划。我们年轻人血气方刚嘛！”加上我姐姐找到辽宁省主席高希滨，把情况说明并打包票：“我弟弟绝不是共产党。”就再也没有问我什么了。

我们的情况后来有所松动，下午可以到大操场上打球和散步。我们洗过两次澡，在不远的地方，晚间十点澡堂停业之后，我们才由宪兵押着去澡堂洗澡。由于我们住的条件差，天气又

冷，换的衣服又少，所以每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每天早晨穿衣服前都先抓好虱子再穿，晚上也是脱下衣服先抓虱子再睡。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虱子，密密麻麻地，一把一把地抓，看着都肉麻，全身不时地发抖、打颤，每天身上都奇痒不堪。

三月初，学校陆续开学了，三女中也不例外。全校有一千多女同学，对我们这些小伙子，都以好奇疑惑的眼光打量。特别是下午课外活动时，我们在操场打篮球运动时，几乎全校的女同学都倾巢而出，观看我们。操场位置在中间，三面都是大楼，正面是大门。所有大楼从一楼到三楼的门口、窗户上都挤满了叽叽喳喳、指指点点的女生。花花绿绿的衣服，五颜六色的头巾，像节庆一般热闹。有时我不打球了，干脆坐在球场边上，从一楼到三楼，逐个窗户看过去，看完了这幢楼再转过身子看那幢楼，欣赏这些妙龄少女，其乐无穷。可惜只能看，不准接触和谈话。可就在宪兵们刺刀的监视下，春光关不住，红杏照样出墙，爱情是束缚不住的。女学生吃完饭十分钟后，我们才集体进食堂开饭，可就在饭桌上留字条和留情书的大有人在。后来听说真有几对认识了，成了情侣，真是坏事变了好事。

四月中，我们被释放了，还有一部份大学生尚被羁留，以后听说没多久也都释放回校了。我回到学校后，即准备购买飞机票，因为我家早已迁到北平生活了。不到两周，我买到回北平的机票，旋即飞回北平家中和家母及姐姐团聚。妈妈高兴得流着泪来迎接我，姐姐笑得合不拢嘴，哥哥和妹妹已去广州了。

由于这次坐牢，我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认为国民党太腐败，乱抓好人。虽然后来全部释放了，但总觉得受了委屈受了罪。国民政府没有给人民充分的自由和民主，而共产党讲的就是

民主与自由，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一党专政，反对贪官污吏和腐败，讲官兵一致，官民平等，穷人富人都一样，共产党肯定比国民党好。而且，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也搞得好，解放前夕，1948年秋天，我们经常到北大沙滩民主广场去参加火炬营火会，他们教我们唱一些进步的歌曲，如：山那边有个好地方、茶馆小调、国民党一团糟、团结就是力量等，对我的影响也不少。